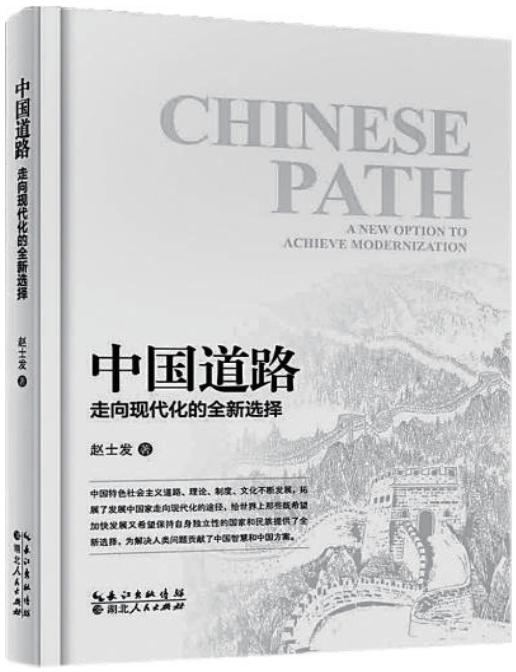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与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
赵士发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一书阐发的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以及它的世界意义。作者突出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定“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自信的科学依据,就在于我们有能力、有条件,坚定不移地、始终如一地坚持改革开放。阅读《中国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一书不难得出以下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是一条实践创新之路,是中国人民道路自信的沃土。改革开放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人民共同富裕,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经过40年的实践发展,中国人民逐渐摆脱贫困,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经济总量跃升成为世界第二,逐渐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人民具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自己的道路自信。

其次,改革开放也是一条理论创新之路,是中国人民理论自信的沃土。40年前,我们党纠正了一度发生的错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事业,先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新时代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具有充分的理论自信。

再次,改革开放还是一条制度创新之路,是中国人民制度自信的沃土。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技术条件等的限制,从上到下的指令性计划往往容易脱离实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逐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制度成果,它让中国人民有了充分的制度自信。

最后,改革开放也是一条文化创新之路,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沃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一方面,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拨乱反正,迅速纠正了一度全盘否定和破坏传统文化的错误做法,大力抢救和保护优秀文化遗产,以辩证的分析态度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也不唯古是依。另一方面,我们也珍惜世界文明大道上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借鉴和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资源。同时也反对唯洋是从,邯郸学步。“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文化上的改革开放,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中国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一书说理透辟,逻辑严谨,语言畅达,是一部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好书。 ■陶德麟

让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学问”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
吴秀明
浙江大学出版社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是吴秀明教授对数十年学术生涯的一次“自我盘点”。吴秀明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历史小说,并逐步将“根据地”拓展至文学史和文献史料研究,始终呈现出文史互渗的学术趣味和治学方向。“文学”与“历史”作为两个关键词,贯穿始终,是其在阶段性和历时性之外所表现出的鲜明特色。在此意义上,吴秀明研究重心的转移和学术“根据地”的开拓可谓水到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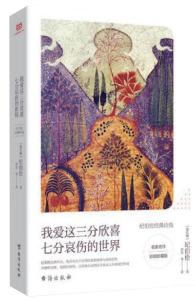
吴秀明强调文史关联,既是学术个性使然,也是基于对当代文学领域“重批评轻研究”现状的忧思。中国传统的“学问”是以考据、义理和辞章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而在建国以来的政治环境和现代学术制度下,传统的“大文科”“大文化观”逐渐退场。文学研究强调理论阐释而忽视实证研究,不仅造成“以论代史”研究风气的盛行,也使知识结构成为几代学者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爆炸”又使这一学风延续至今。相比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基础史料建设,当代文学的“底子”过于薄弱。即将迎来七十岁华诞的当代文学已不再“年轻”,也开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知识谱系;而文学史料研究的“滞后”已然成为阻滞当代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在“知识的积淀”颇为迫切的当下,在环环相扣的“学术链”中承担“这一代”应该承担的学术使命,是他主张一部分学人从千军万马批评的大军中分离出来到图书馆、档案馆从事学科基础建设工作的原因之一。毕竟,丰富、多样与多层的研究是营建良好学术生态、推进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历史补课”的“吁请”即与此相关。

当然,对史料和实证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贬损批评和阐释的重要性。“整体性的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要求研究者建立以“史料实证”“作品解读”和“理论思维”为内容的“三元一体”的知识结构。而这也对文学研究的真实性、艺术性和思想性提出了综合要求:在肯定艺术逻辑的独立性和自洽性的基础上,承认“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内在关联;在提倡理论阐释的深刻性的同时,主张“‘事实’与‘意识’之间的互渗互融”。在当前高扬理论和审美话语的文学场域下,重提史料对文学研究的基础性价值,是推动研究进入较高水平与层次的要求。此外,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主观的,不应视史料为文学研究的“工具”,也不应使文本降为实证研究的“材料”。“在史实还原的基础上表现出一种重诠历史的历史判断和意义指向”,获取“再出发”的动力,是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的现实意义所在。而这,则对研究主体的史观和史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的应有之义。

作为当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参与者,本书的编写是以对著者自身的治学理路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具有双重的回顾和概括意义。在体例上,本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辑录了著者近年来在文献史料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探讨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传统、现实境遇、基本内容等问题,从学科建制、文学教育、知识学养等多角度探讨文献史料的研究路向和价值意义。“文献史料研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年轻成员甚至新领域,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整体的研究框范提出了调整的要求,这也为当代文学历史化、学科化奠定了切实的基础。中编“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从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整体性文学史的编写、文化转型与海外汉学等角度把握当代文学的内在特殊性和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外部环境变化,在兼顾历史逻辑和时代新质的基础上为文学史编写提供了新思路。下编“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则收入了“作品论”和“形态论”方面的文章,并从批评和理论两个层面,包括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历史观问题、“影射”问题等,对历史小说进行了归纳和爬梳,从而使之从一般的作品评论上升到形态理论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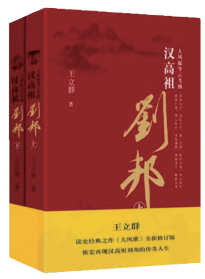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作为吴秀明的学术论文自选集,从文史关联的角度对数十年的治学生涯进行了一场回归之旅,也是将个人的“小历史”纳入历史脉络进行考察的一次尝试。将历史作为审美之维的重要补充,以史学的审慎加于诗学的灵动之上,这使吴秀明研究呈现出作为一种“学问”的稳健、厚重和大气。 ■俞清瑶

悦读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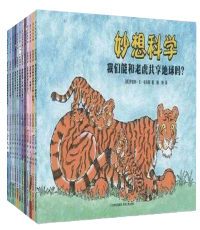
《我爱这三分欣喜七分哀伤的世界》
作者:纪伯伦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纪伯伦的代表作品《先知》《沙与沫》《泪与笑》,内容丰富,可读性极强。纪伯伦的作品极具诗性,饱含对于世界的深刻思索与体悟,充满了真挚的热爱以及深思之后的哀伤,读来发人深省。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刘邦》
作者:王立群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全书以刘邦从平民起兵至开创大汉王朝的传奇经历为线索,全面还原了布衣天子汉高祖刘邦的一生,并讲述了和其有紧密联系的项羽、张良、韩信、萧何、陈平、曹参等秦末汉初著名历史人物的不凡生平,展现了秦末乱世群雄逐鹿、楚汉争霸的风起云涌之盛势及汉初天下大定广封诸侯的升平景象。



《妙想科学》
作者:罗伯特·E·韦尔斯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套可以让孩子在轻松愉快并且非常有趣的气氛中学习科学知识的图画书,它没有僵化地直接描述抽象概念,而是用很多具体的、充满奇思妙想的、看似不可思议却又符合科学原理的小故事,把枯燥的科学知识及术语传递给孩子。